



人口、城市与环境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THE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ON
POPULATION,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0 —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组织撰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



人口、城市与环境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THE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ON
POPULATION,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0 —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组 织 撰 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城市与环境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组织撰写.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161 - 3973 - 8

I. ①人… II. ①中… III. ①人口学—研究报告—2010～2012②城市学—
研究报告—2010～2012③环境科学—研究报告—2010～2012

IV. ①C92②C912.81③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692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年度新进展综述〉、〈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编撰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于2013年组织全院各所撰写2010—2012年的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支持与努力下，共有38个研究机构撰写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分类名录》，我们按照6个学科门类、41个一级学科对研究报告进行了编纂，总计18卷，构成《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图书出版。

组织策划《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旨在评估各学科发展状况，及时跟踪国内外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值此《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图书面世之际，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领导、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同时，撰写《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是我们加强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尝试，藉此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期待国内外学界同仁对进一步完善《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的撰写予以指导和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7月22日

目 录

制度人口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
(一)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的讨论	(2)
(二)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10)
(三)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应对	(15)
(四)制度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17)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8)
(一)主要研究成果	(19)
(二)在研课题	(21)
四 学科发展前景	(21)
劳动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2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22)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2)
(一)中等收入阶段的劳动力市场特征	(23)
(二)劳动力市场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5)
(三)金融危机与就业冲击	(27)
(四)就业结构变化与就业两极化	(29)
(五)社会保护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32)
三 学科建设状况	(34)
四 学科建设状况	(36)

五 学科发展前景	(37)
人口统计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39)
一 学科发展概述	(39)
二 学科前沿动态	(40)
(一)生育及相关政策	(40)
(二)健康水平及死亡率研究	(43)
(三)迁移与流动研究	(45)
(四)人口统计数据的收集、评估与调整	(46)
三 学科建设状况	(47)
四 学科发展前景	(48)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5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52)
(一)学科体系建设	(52)
(二)方法论讨论	(53)
(三)理论建设	(53)
二 学科前沿动态	(53)
(一)协调发展的测量与评价	(53)
(二)资源环境承载力	(54)
(三)粮食安全问题	(55)
(四)能源安全问题	(55)
(五)低碳与经济发展	(56)
(六)国外理论与方法的进展	(58)
三 学科建设状况	(60)
四 学科发展前景	(62)
社会保障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70)
一 学科发展概况	(70)
二 学科前沿动态	(71)
(一)国内研究	(71)
(二)国外研究	(76)

(三) 国外的著名学者及著作	(78)
(四) 国内社会保障研究的主要学者	(79)
三 学科发展前景	(80)
劳动关系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85)
一 学科发展概况	(85)
二 学科前沿动态	(86)
(一) 西方劳动关系理论阐释与适合中国国情的 劳动关系理论探索	(86)
(二) 《劳动合同法》等法规的实施状况及其影响	(88)
(三) 工会改革与工会的作用	(89)
(四) 集体协商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	(90)
(五) 劳动争议和集体性事件	(92)
三 学科建设状况	(93)
四 学科发展前景	(94)
城市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99)
一 学科发展概况	(99)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00)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07)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08)
环境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14)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14)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14)
(一) 生态文明研究	(115)
(二) 生态补偿与环境污染损失计量方法研究	(116)
(三)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效益分析	(117)
(四)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控制	(118)
(五) 低碳发展研究	(119)
(六)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	(120)
(七) 政府环境绩效管理研究	(121)

(八) 国际环境管理经验与借鉴	(122)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25)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26)
城市与区域管理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33)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33)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33)
(一) 城市管理概念的发展	(133)
(二) 城市管理研究的重点领域	(134)
(三) 城市管理方法的研究	(136)
(四) 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137)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39)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41)
城镇化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43)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43)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44)
(一) 国外研究动态	(144)
(二) 国内研究动态	(147)
(三) 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	(154)
(四) 重大理论创新	(158)
(五) 热点问题	(159)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63)
(一) 总体态势	(163)
(二)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学科建设进展	(164)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67)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70)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70)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70)
(一) 国际气候制度与谈判动态研究	(170)
(二) 国际气候制度发展动因和规律研究	(174)

(三) 气候公平问题研究	(175)
(四) 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的新方法	(176)
(五) “里约+20”会议和相关研究	(177)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79)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81)
 气候变化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186)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86)
二 学科前沿动态	(186)
三 学科建设状况	(193)
四 学科发展前景	(195)
 房地产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20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202)
(一) 历史沿革	(202)
(二) 队伍建设	(203)
(三) 研究成果	(203)
(四) 优势与问题	(204)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04)
(一) 国际研究动态	(204)
(二) 国内研究动态	(205)
三 学科建设状况	(208)
四 学科发展前景	(210)
(一) 近期学术研究计划	(210)
(二) 研究队伍建设规划	(210)

制度人口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2010—201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制度人口学是研究制度（包括政策、法律及法规、民间习惯和宗规族训等）与人口数量及结构、流迁分布、生存方式等关系的学科。人口行为（生育、死亡、空间变动）尽管有很强的自然属性，但却受到不同形式制度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当代社会表现得尤其突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的制约、户籍制度对人口流迁的作用等，人们有切身感受。

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至 90 年代低生育水平即已形成，并长期维持下来。人口年龄结构由此受到影响，2000 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口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结构 2011 年发生了初步改变。中国当代劳动力流动非常活跃，但人口迁移还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对于社会转型中的人口问题，须有制度性措施加以解决。

制度人口学具有很强的现实观照意识，而转型社会中与人口有关的社会问题均有制度因素的作用痕迹。制度人口又具有跨学科特征，这在 2010—2012 年的研究成果中有充分体现。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是制度人口学的主要研究力量，同时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有介入。可以说，这三年是制度人口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发展蓬勃、新作迭出的阶段。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从制度人口角度看,2010—2012年间,生育政策调整、户籍制度改革这两个分别与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迁移流动有关的问题是研究的热点。此外,与人口老龄化、家庭相关的制度应对和改进也为研究者所关注。

(一) 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的讨论

中国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于1980年。它旨在使中国人口总量在20世纪末被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一政策的影响巨大而深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发生与传统有别的变化。至2000年中国已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较快。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中国城镇地区累积了一大批独生子女家庭,其在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维系方面多有不足。未来劳动力供给也因此受到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不同领域的学者(以人口学为主,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提出自己的见解。2010—2012年这一讨论仍在继续。

1. 主张调整现有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

在人口学者中这似乎已成为主流认识。就多数观点来看,学者们并非反对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主张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调整,放宽生育限制。

(1)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理由

这期间,研究者的认识相对集中在以下方面:

①人口老龄化论 多数学者从中国人口结构变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角度强调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王桂新将调整生育政策视为克服已经出现的人口危机的一项措施。在他看来,当前我国不仅存在人口问题,而且已出现深刻的人口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少子化、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了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要深刻认识人口危机的严重性和破坏性,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夯实经济基

础,努力把我国的人口危机及其破坏性控制到最小。^①可见,现行生育政策下人口老龄化加重是其主张调整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一些学者以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为参照,指出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迫切性。左学金认为:我国人口生育率过低的风险正在增加。近邻日本正在经受持续低生育率的苦果。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23%以上,财政支出的一半用于社会保障相关支出,而财政收入的一半靠举债,以致内债占GDP的比例高达220%。除了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税负或削减老年人口的福利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②王桂新也有此担心:从长期趋势来看,生育率一旦下降到很低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而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已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提高其生育率,却未见成效,深陷于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危机之中。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很低,目前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如果适时调整生育政策,还是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否则调整政策的意义就失去了。^③

孙博等通过城镇人口发展预测模型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预测模型测算了不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2010—2080年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在不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2038年之前,我国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和城镇养老制度内老年抚养比差异不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尚未出现缺口。2038年之后,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出现差异。具体来看,在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下的养老金缺口峰值最大;目前“双独生二”政策有助于缩小养老金缺口。然而,实时普遍开放城乡二胎政策,能显著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对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贡献也更为明显。因此,从缓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促进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讲,目前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及时调整,逐步放开二胎生育。^④

②劳动力短缺论

① 王桂新:《我国“潜在”的人口危机及其应对之策》,《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第30—39页。

② 左学金:《避免极端生育率》,《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5期,第17—18页。

③ 王桂新:《我国“潜在”的人口危机及其应对之策》,《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第30—39页。

④ 孙博等:《生育政策调整对基本养老金缺口的影响研究》,《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7期,第101—107页。

在研究经济的学者中,认为现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劳动力短缺的观点不在少数。

汪伟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时,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将可能影响经济中劳动投入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应当从政策设计上未雨绸缪。在不久的将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①

③生育权利论

把生育视为夫妇的一项基本权利,放宽生育控制政策使民众有更多的选择权。

游允中认为:许多国家的家庭、婚姻和生育之间的关系都在不停地改变,我国的生育水平也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继续下降。为了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权益与家庭的幸福,必须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②

周长洪指出:我国人口控制任务已基本完成,继续保持超低生育率并不能解决人口多的问题,相反会对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取消“一孩”政策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人口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更是生育权利的合理回归和保障家庭发展与幸福。^③

④抑制性别比偏高论

关于生育控制政策导致性别比升高的讨论在人口学界已有多多年。但放开二胎能否缓解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

汤兆云和郭真真的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是三次曲线关系。要真正实现出生性别比的自然平衡,国家实行适度宽松可行的生育政策势在必行。^④

① 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第63—72页。

② 游允中:《一孩化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第34—36页。

③ 周长洪:《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3期,第34—40页。

④ 汤兆云、郭真真:《生育政策与经济水平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1期,第10—21页。

⑤独生子女家庭脆弱论

不少学者对独生子女家庭延续的脆弱性有忧虑,有的称之为风险家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已有一定数量的“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夫妇中年之后,其子女因生病或因各种事故而死亡)。独生子女父母为国家的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他们已经或即将遇到的问题理应得到政府的关注和具体帮助。

陈友华指出: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中国计划生育已经陷入矛盾陷阱:一方面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陷,对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补偿与救助;另一方面仍在继续鼓励更多独生子女的出现。独生子女政策在付出巨大的成本与代价后换来的却是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与“花钱买风险”无异。终止独生子女政策是规避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必然选择。^①

⑥现有生育控制政策约束力有限论

为落实现有生育控制政策,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但在育龄夫妇生育观念基本转变的当代,政策所约束的只是少部分夫妇。

杨菊华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且现行生育政策仅能有效控制大约6%的育龄妇女。在低生育水平已持续了近20年、理想子女数大约仅为两个孩子、现行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控制作用大大减弱的情势下,未来维持低生育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推行现行生育政策与“放宽二胎、杜绝三孩”的生育政策之间差别就不会大;而如果超生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既会大大降低生育政策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②

(2) 生育政策调整的路径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并不存在生育二胎的限制。有的地区在讨论对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是否也可享受这一照顾政策。而学者们的主张为取消二胎限制,当然在实施时间上认识有别。

①尽快放开二胎

① 陈友华:《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第19—32页。

② 杨菊华:《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2011年第2期,第5—20页。

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入分析,曾毅指出,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生育政策,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存在的诸多弊端,显著缓解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又避免生育堆积,造成人口失控,是民众和国家的“双赢”。^①

②放宽二孩生育

杨菊华认为: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继续推行现有政策与实行“放宽二孩、杜绝三孩”之间就不会有多大差别。如果这个判断还算合理的话,那么,在“十二五”期间全面放开对二孩生育的控制,就未必一定会导致又一个生育高峰。如果在放开二孩生育的基础上,加上生育间隔(从而扩大代际间隔),则从长远视角看,人口控制的效果将更明显。^②

③分步骤渐次放开二胎政策

石人炳等认为: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政策调整的目标是从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到城乡普遍放开“二孩”的“一元”生育政策,其实施可分两个阶段逐步过渡。第一阶段:“单独”过渡期(2011—2016年)。具体实施时间从2011年开始实行“单独”放开政策,即无论城乡,只要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第二阶段:“全面二孩”过渡期(2017—2020年)。2017年之后,开始在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即无论城乡,无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③

④以回归到更替水平为目标

王桂新认为: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近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远没有这么高(大概只有1.2)。参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综合不少学者利用多途径数据和多种方法的比较研究结果,可以确认我国近年基本处于1.5左右的低生育率水平。为慎重起见,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再组织多方面学者进行深度论证,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统一对我

① 曾毅:《普遍允许二孩,民众和国家双赢》,《社会观察》2012年第9期,第23—25页。

② 杨菊华:《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2011年第2期,第5—20页。

③ 石人炳、张维:《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第17—22页。

国目前生育水平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口变动周期长、惯性大的特点,尽快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或接近更替水平。^①

(3)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问题解决的有限性

彭希哲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人口问题,并不是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就能够解决的,许多和人口有关的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在于人口本身,因此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工具可以是人口政策,也可以是整合的社会政策体系,各种政策自身及其组合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完善。当一个社会政策的初始目标已经实现,而政策实施形成的风险和负效应不断积聚的时候,继续维持政策不变的社会经济成本就会不断增加,那么这个政策就应当适时地进行完善、调整。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也包括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的参与,才能把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降到最低,收益调到最高。^②

2. 反对调整和放宽生育限制

在人口学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压力并没有消除,中国人口总量还很庞大,故主张维系现行生育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学界之外,有学者持一种更为激进的主张,以程恩富为主要代表。他认为: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尚未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之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并从生育权利、人口密度、人口老化、性别失衡、高质二胎和独子性格共六个方面论证其主张。^③可见,程恩富的“新政”既沿袭了现行生育控制政策的基本思路,又有更为严格的表现,如“城乡”均实行一胎政策,同时奖励不生育者。

3. 如何制定人口政策

一些学者反思我国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作为一项关系千家万户实际利益的国策,政府在考虑国家目标、社会效益之时,也要对家庭利益有所顾及。

包蕾萍认为: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

① 王桂新:《我国“潜在”的人口危机及其应对之策》,《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

② 彭希哲:《应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挑战》,《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5期,第20—21页。

③ 程恩富、王新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人口研究》2010年第6期,第78—91页。

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就现行生育政策的运作机制来看,事实上是忽略了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中间组织即家庭的作用。家庭不再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生育数量进行选择。^①

湛中乐和谢珂指出:我国的生育政策主要以立法、行政决策和党的规范性文件为表达方式,生育政策在生育数量、社会抚养费和对违反法律、法规生育者行政处分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生育政策制定和调整过程中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缺失。他们强调,良好的生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需要多领域专家的论证,以专业性和中立性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同时也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通过组织化的基本权利之利益诉求的表达来保证政策的民主性。^②

4. 生育政策的效应评估

对生育控制政策在人口总量规模减少中所起作用进行评估,可以说自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这类调研和分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2000年及其前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20周年之际更形成了高潮,有多个版本的评估报告发布。2010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计划生育政策评价再次受到重视。

陶涛和杨凡认为,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他们据此得出结论: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③

周长洪、潘金洪根据中国各省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规定,以公安部2006年户籍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及计划生育管理实践中的有关数据,推算出中国政策规定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56.0:42.9:1.1,中国人口政策预期终身生育率上限为1.45。在考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中国人口预期终身生育率实际上限为1.65,实际预期终身生育率与政策预期终身生

① 包蕾萍:《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90—101页。

② 湛中乐、谢珂:《论生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一个过程论的分析视角》,《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第2—18页。

③ 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3—112页。